

工艺：

巧艺时遇

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第十辑）

主编：郝苏民 马忠才

李旭等著

甘肃省民俗学重点学科建设基地
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中央民族大学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甘肃省民俗学重点学科建设基地
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工艺：

巧艺时遇

线的田野报告（第十辑）

主编：郝苏民 马忠才

李旭等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工艺: 巧艺时遇/李旭等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4. 9

(人类学·民俗学: 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第十三辑/
郝苏民 马忠才主编)

ISBN 978 - 7 - 5660 - 0646 - 2

I. ①工… II. ①李… III. ①民间工艺—研
究—中国 IV. ①J5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1710 号

工艺: 巧艺时遇

作 者 李旭等

责任编辑 吴 云

封面设计 智一视觉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8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646 - 2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我们的学科之路，这样走来

（代总序）

30 年前的 1984 年，原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创办了西北民族研究所，动机原本出自对“十年动乱”反思后的一个学科基本建设之举。所名还是其时国家民委领导人拟定的。这个反思的主旨，是出自这样一种回顾与思考：新中国人民政权，一反千年封建王朝与国民党政府大民族主义的统治惯制，要实现各民族当家做主、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于是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培养少数民族各类型干部成为一切首要。为此，应运而生了民族高校的创办。共和国第一所民族高校，便是西北民族学院。她的办学是强调族群性的，也突出了区域性。因此，“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关键词应是“西北”、“民族”、“研究”。毋庸置疑，民族高校的学科建设和办学特点，对全国其他普通高校而言，亦应如此看待。

应该说，民族学院类型高校群的产生，确系中国教育史中最崭新而灿烂的一页。然而，西北民族学院从成立伊始的 1950 年，直至 1984 年前，却未曾有过科学意义上成体系的民族学的理论研究、专业建制与教学队伍与体系的组建（这与稍后 1951 年在首都北京创办的中央民族学院的情形：有中国学界老一辈中外著名专家吴文藻等以及早已成为领军人物的费孝通、林耀华等学术大师群体的存在有别）。虽然学科建设上的这种“空缺”，责任与损失并不都来自学院本身与其时奉命而办学者个

人，它与当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学科等的境遇完全是一致的。随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的确对有志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等的学人们应是一个极大鼓舞。所以说，1984年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创办以及《学报》创办问世，从高等教育着眼看问题，便是当时本院民族学人与高教工作者学术心愿的首次圆梦！

然而，发展道路又总是曲折的。“市场经济”转型，带来所谓“全民下海”冲击，本在“意料中”的事实，而“单位”创收，导致高校捷足先登者从办班中捞取的第一桶金，诱惑本在坚守岗位的教师之力，却是令人“意料之外”！希冀重建人类学/民族学的敢想者中也出现了教学与科研比重的意见分歧，科研经费和基础建设等问题无从提上日程的迷茫，凡此直接涉及成员工作量、职称等切身利益的不平与困惑。自然，复杂的表层不能掩盖其简单的内因：历史转折关头老校如何“新生”，学校未来整体发展如何构架？对普通高校而言，民族类高校的不可替代性特点究竟何在？民族院校的时代性角色该怎样定位，哪些是实践实证了的真正“拳头”专业？应恢复、重建哪些机构？又该急速补缺扩建哪些必有的学科？哪些专业由一般普通高校去办比民族高校会更有条件……实话实说，这些本为办学内行领导所关心、研究的事情，因“文化大革命”后遗症受到了影响。

经过彷徨、内外沟通，几经“阵痛”，终于在1998年10月，借教育界连续改革热潮启动和校方领导的理解与支持，原西北民族研究所的我们个别人，决定以放弃原基础资料设备和经过好几个年头整合的学术队伍，以及已在全国圈子里开始产生影响的“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品牌”名称、建制和大部分成员为“妥协”代价，重组三五个青年学术同道加个别老先生，走出原西北民研所的大门，重新组合了“社会人类学·民俗学”

系、所合一的机构，另起炉灶，重开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志学）、民俗学的学科建设。

这个人类学、民俗学名称的出现，为“共和国首座民族高校”办学近半个世纪后首次整合，填补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专业从未有过的科研与学科空白；也在西北民院首出“系所合一”的教学形式，把科研直接引入课堂教学。在大西北人文社科学界第一次出现了人类学、民俗学的学科建制。不久，在费孝通教授力荐下，又借教育部为北京大学批办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契机，与北京大学合作在西北重镇兰州举办第六届高研班。

费孝通先生煞费苦心的目的有二：一为扶持西北民大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开创；二为开发西北研究培养专业人才。费老亲临我校为我系揭牌，并在会间主题讲演；召开来自大西北各地青年的各类型座谈会，谈到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专业人才的重要和迫切意义。他语重心长、深入浅出，这给有志学科建设者们以极大精神支持和学术“扶贫”。

5 1990 年我们曾首获民间文艺学（含民俗学）硕士学位授予权（马学良、宋蜀华、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唯图学术的胸怀和勇气，成了真正“助人成功”的关键），1991 年我们开始招收民俗学研究生。鉴于我们对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多元现状及其特征的本土理解，在组织教学与科研上，确定了重视田野作业，开辟民俗志积累，坚持多民族地域多元文化特色，从头打好学术基础建设的发展思路。再加上人类学/民族学教学点的逐步开拓与社会学教学，我们打通了三门学科的交叉，以往全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传统教学仅设在中文系（汉语系）多作为讲座课（选修课），以每位研究生入学，必经“始业课”的专业启蒙，作为来自不同专业本

科生开始研究生教学的“补课”；同时，强调导师要根据研究生个人旨趣和优长（或民族或地域）为本，定其专业研究的具体方向，而不可仅仅依据导师“课题”之需确定研究生的发展方向。随着实践的延续果然局面顿开。至2012年，这个教学点（含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学两个研究方向）共招生了10多个民族的硕士研究生147名，已毕业获得学位者132人。在毕业生中近三分之二成为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考博人员，他们分散于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中山、复旦、南开、南京大学、中央民大、华东师大、东南大学等多所名牌大学攻读、“进站”；至今，其中有的已成长为名校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从2004年开始，又开始了招收攻读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学博士生，至2012年已有12人获博士学位。这一集中现象是西北民大创办以来其他院系、专业所未曾有过的。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人、训练队伍的同时，积累了不少以专业要求采集到的比较有质量的田野民俗志的新资料。尤其在其后以降，费孝通教授提出西部大开发中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开发的问题后，我们在承担“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内民俗部分的任务中，坚持了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发挥地方性知识和民族语言无障碍的优势，深入生活第一线，零距离现场考察的专业训练学风。民俗学研究生教学实践，在历练了教学骨干的同时，区域民俗志资料成果累累结枝，积累了几百万字的民俗志数据库资料。

我们这个系（所）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艰苦奋斗，借助全国形势好转带来的时运，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我们把民俗学的整体学科建设、发展路子，摆脱开往昔传统上仅从“文学”上先入为主地唯以“民间文学”以带动民俗学的旧教学轨道，借鉴相近学科人类学（民族志）、社会学、民间文艺学优势，既互相交叉渗透、互促发展，又各自保

持相对学科独立发展的轨迹。我们用超强的劳作先后开办出游牧、农耕、人口较少民族等民俗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类型；民族、宗教、文化、家庭、妇女、影视、民间艺术（美术、工艺、歌谣、戏曲、舞蹈）等专业方向，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学生学养的丰厚、“一国多民族”的整体性大视野提供空间，以适应转型期人才市场的多样需求。目前，我们除已有的民俗学研究生点外，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和民间文艺学等的硕、博研究生都在培养之中。

6 五年来，我们有北大、北师大、中央民大等高校相关先进专业和其中名师们的协助和具体帮助，在大开局面中崎岖前进。我们的民俗田野，涉及西北各民族地区外，也借主题的需求而波及内蒙古、西藏、新疆、四川、华中及至华东，甚至东北各地以及海外。在物质条件极不足的状态下，坚持依靠业内同行办好我们的专业学刊《西北民族研究》，获得学界广泛认同，成为CSSCI刊物；也成为这三个学科硕博生和专业教师们喜爱的一块绿色学术平台。目前，《西北民族研究》已成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我们正努力把促进、服务于教学、科研和社会的学刊，办成“文化走出去的”学术品牌。

我们的学科基础建设和教学实践使我们体会到：虽也无法回避目前还存在于体制上的掣肘和终于常规仍存距离的艰辛事实，但各高校圈内同行认可的这个路子，亦可视为一种有益的中国地方学术实践经验。事实上，在我们之后，也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界大师级老一代代表人物费孝通、马学良、钟敬文等谢世之后，我们看到从北京师范大学到内蒙古师范大学，也都先后改制或创办了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模式的教学建构……我们自己是欣然的。

7 高校在一阵扩招、扩办、并校、升级之后，据说出于

“冷思考”的调整把高校分类为“研究型”、“教学型”几种发展类型，又似乎学校一旦被划进某种类型后，即将在某类型框子内以行政“规范”去管理（如何有竞争）。各校内各学科、专业之间大约已有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是将随所属学校类型“一刀切”而去存在、发展？还是以所属行业学科实际水平去“强强联合”（如同当年之“院系调整”）去整合？还是随其各校自主“挖墙”、“流动”、“自生自灭”，以示“市场经济”在教育上的反映？抑或已有资源自主存留等市场经济范式……在如今高校领导层似皆为教育内行，大都系博士、教授的现状下，自主趋势如何发展大学，仅为普通身份的专业教授在学科建设、发展中能发挥多大作用？目前难以预测。虽说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对象关乎群体、社会、国家认同与人类的大范围，但似乎此类学术属性在中国，往往不像办体育、办艺术那样红火而幸运；确是一种不大显露政绩的“孤独性”学问、学科，得到在意“政绩”、“指标”的领导眷顾，常常是不易的。

好在我们曾经的努力基于事实，亦曾经被其时业内所认同过；“助人成功”之说，本为各自所指各有个人的理解、界定和认可。无论如何师生风餐露宿的“田野”是为学执著的“书呆子们”汗水的播种。于是，仅仅出于其时一个教师的我们，本着曾经为师之心、师生同窗切磋，或曰“教学相长”之情，将把部分学子为攻读学位而参与的调查报告，做初步学术规范和可读性的整理后，以一种资源回报给社会群体，也为这世变方激的新世纪之际，师生们从前沿生活大潮中舀出的这一瓢瓢底层的浪花，存留给来者而感到努力过的欣慰！我们自认为这一行动对当前学术浮躁尚不能一个早晨就烟消云散的今天，于师、于生、于己、于众，更于学校之心，当年大师之良苦用心，皆心同此理吧！

§ 若有幸，甚而尚存继续从业之机，我们随时准备用被边

缘化了的文化行为寻求可认同的学术合作伙伴。

我们的“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的编辑，虽也曾得到本学界不少贤达鼓励、促成，但终因未能直接挤入本土的“工程”类和“扶持”类，不足的经费导致了它无法“满书尽披黄金甲”的华贵包装及名人作序牵衔，只能是“素面朝天”，以真人真事的朴实面孔迎接她的识者——广大学子读者了。

本系列之一，曾应方李莉女士建议配合中国艺术研究院“基础数据库”重大项目中民俗部分采集，归入另一丛书出版；本系列之第二、第三、第四共三辑经本校现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文化（苏依拉）教授之力得到本校资助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之后，系列之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共四辑由郝苏民得到祁庆富教授支持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丛书出版。到此，这一系列共八本书，是分别由三处支持才问世的。但是从西北民族大学初创社会人类学·民俗学专业到培养出自己的硕、博士研究生和他们的成果，我们实在是得到了不少贤达和学界志士仁人在关键时刻的真诚爱护、支持和帮助才有些许作为的。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又逢“国学”重新被大大提倡，教育新时代青年一辈也要知恩图报，不可满城尽当“白眼狼”之际，我作为这个系列各辑成果出版的操办和见证人，深深体味了出版学术书籍的不易，不能不郑重提出下列先生和同学，因他们的关爱、辛劳，作为其时导师今日主编的我以及各辑的撰稿人在此一一向他们致以中华民族传统式的抱拳和鞠躬：真诚地谢谢你们了！除已经鸣谢之外，他们应是：费孝通、马学良、宋蜀华、祁庆富、马麒麟、谢玉杰、马戎、杨圣敏、王铭铭、金雅声、何烨、文化、沙平、马国柱等诸位先生、女士！

本系列之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共四辑出版后，据出版社

回应，意料之外地收到良好的市场效应。那么，又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社会上还有人自愿阅读，任何凭空之话已无意义；就顺乎读者与学科的“民意”继续办下来了！于是，我们终于以省民俗学建设基地之资格和所获基金和“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支持，继续我们系列的延续，这是本系列第三批成果的出版，是继第九辑之后的延伸。

我们还可欣慰地告诉民族民间文化爱好者的是，我们的坚持不仅仅在硕士水平的田野成果的数量上；博士生的田野成果，也将与此同时以“西北民族大学民族民间文化博士论文系列”同步由民族出版社问世。我们相信这应该是一个质量上的努力。

本系列六辑（九至十四）出版受到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基金支持，特致谢忱！

是为序。

A. 速莱蛮·郝苏民

2005 年 12 月岁末于金城沙痕书屋

2007 年元月修订

2013 年 7 月 9 日病后再修订于葵巳酷暑中

目 录

山东郛城泥塑神像的调查研究	李 旭(1)
山东鄆城谢家砖塑的艺术特色探究	郜翠平(75)
山西省岚县“岚城面塑供会”民俗活动考察研究	
——以面塑供品为中心	张燕霞(142)
山西中阳民间剪纸的传承与保护	
——以庞家会村为个案	刘彩清(212)

山东郓城泥塑神像的调查研究

李 旭

一、前 言

（一）选题背景和缘由

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文明的结晶，是联结民族情感的纽带，是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国人越来越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学术界要求对非物质文化进行研究和保护的呼声也日益强烈，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基于这种状况，笔者曾有志于山东郓城民俗文化的调查与研究，因为那里不仅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还是笔者的家乡，便于从主位的视角对民俗事项

进行田野调查；而且，作为民俗学专业的学生所受的专门训练又能使笔者理智地采用客观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分析研究，达到理论的高度。所以，在导师的指导下，经过实地的调查研究和一段时间的思考，笔者决定把毕业论文锁定在山东郅城泥塑神像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事项上。原因有四：（1）泥塑神像中包含着丰富的民间文化和民俗观念，融入了民众诸多方面的智慧。其图案造型都是运用象征寓意来寄托民众的生活、理想、愿望和追求，具有某种神秘性而表露出文化的远古的魅力。它承载了艺术图式以外的种种含义并超出了艺术以外的种种功能和价值，这一民俗事象作为民间文化的历史积累和民间文化传统的具体表现也生动地反映了民间文化受民俗观念、民俗心理的支配和规范的性质特征。笔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田野作业和对学科专业理论知识的独立思考，对山东郅城泥塑神像做出民俗学学科意义上的深入的分析研究。（2）泥塑神像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民间的精神史，是老百姓心理希冀的展示。在神像中，老百姓寄托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但永远也不会放弃的那种恒久的精神内涵。历史上，它作为社会的一种“软控制”手段，在乡土社会起着协调民众关系、凝聚民众力量、寄托民众理想、缓解社会矛盾等作用，从而塑造了和谐稳定的心理环境，有利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研究泥塑神像的民俗信仰与民众生活的互动关系及其与民众的利益诉求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3）泥塑神像文化有着较强的生命力，它并没有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消失，却有一度复兴的趋势，这其中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与它的俗民及其生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部联系。它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是因为它满足了历史上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群体的需求，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笔者认为它除遵循民俗事项变迁的一般规律外，必定还有它独特的文化内涵。探讨从远古就存在的万物有灵论的思维发生演变史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有利于我们把握现代

化背景下人们强烈的物质精神需求与泥塑神像文化的关系。笔者希望自己的论文以山东郅城泥塑神像中所蕴含的民俗观念为窗口,用精神分析等方法探析宗教信仰功能,在某种程度上窥探人们的信仰心理及其内心世界。因此,本选题对中国民间俗信而言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和覆盖面。(4)从笔者搜集的文献资料看,目前对泥塑的关注与研究大都集中在泥塑的制作过程和造型艺术等方面,多是从民间美术学和民艺学角度来论述,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精神分析角度研究的尚未看到。本文试图从民俗学的视角,综合运用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审美学、心理学、文学等相关的理论与方法,对山东郅城泥塑神像与人们的生活信仰的密切联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希望在探讨泥塑神像的人文价值和民俗功用方面作一次尝试性的实践。

正是基于上述对山东郅城泥塑神像民俗文化的思考和关注,笔者选择以“山东郅城泥塑神像的调查研究”为题,力图在研究郅城泥塑神像民俗文化的同时,为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做出一点有益的探索。

(二)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滴水也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郅城泥塑神像作为民间工艺民俗中的一个因子,就好比是非物质文化这个海洋中的一滴水,它的历史变迁必然遵循着所有民俗文化进展的规律。在笔者搜集资料文献的过程中,注意到法国社会学学派杜尔干在其宗教定义中坚持的两个因素:“一个是神圣象征或事物的存在,另一个是与有组织的仪式活动相联系……而这种力量本质上就是统治人类的社会力量。^①”王铭铭教授在论及中国民间宗教时认为:

^①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第102页。

“神身上穿的是命官的官袍；他们住在庙宇之中，受神将的保卫……并喜欢受贿赂……中国民间仪式雷同于衙门的政治交流过程，是一种意识形态交流的手段，具有自己系统化的符号与程序。”^① 其论述对笔者启发很大，神灵世界实际上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宗法社会儒家思想观念的体现，是封建统治秩序“官本位”的象征。因而，笔者考察这一课题的目的和意义是：第一，以往民俗学研究的历史基本上是民俗模式的研究史。民俗学家们习惯首先把发生的民俗转化为记录的民俗，但他们的记录遗弃了发生情景，而且抽象出活动的主题。民俗学家更应该关注民俗的各种存在形态，而不应该只限于研究民俗的一种形态，应该探讨民俗的各个方面以及各个方面互动而成的整体，必须恢复那些被抽象出去了的内容，也就是说，民俗学应该从民俗模式研究上升到民俗生活研究。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华夏文明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先民们创造了虚幻的神灵世界，并相信人类世界与宇宙天地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契合，由此构成了中国民众的精神信仰和祭祀心理。与其说是神创造了人，不如说是人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创造了神。人们对庙中神灵的崇拜信仰是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民众的信仰力量使庙中泥塑神像得以延续到今天。本文试图开拓民俗学视野下泥塑神像研究的新领域，探讨泥塑神像与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将泥塑神像文化的研究推向纵深发展。第二，通过实地调查，比较全面地分析、描述泥塑神像文化的民俗功用及人文价值，并且以泥塑神像文化研究为契机，站在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探讨民间工艺在现代和未来社会的功用与走向。本文将研究内容和对象定位在泥塑神像，是因为神灵信仰是最古老的信仰，

^①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64、第166页。

它在各个时期的变化是中国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变化的缩影，这一民俗事项作为民间文化的历史积累和民间文化传统的具体表现也生动地反映了民间文化受民俗观念、民俗心理的支配和规范的性质特征，既有理论探讨价值，也有强烈的现实性与当代性，因此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笔者的思路正是想以小见大，通过对郓城民众泥塑神像信仰的分析研究，试图达到认识、说明俗民信仰心理及其内心世界的目的。第三，目前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些区域的民间信仰、仪式和象征复兴的状况，反映了民间把“过去”的文化改造为能够表述当前社会问题的交流模式的过程。在 21 世纪的今天，还有以泥塑神像为职业的现象出现，并且功利与审美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性能在其身上和谐地统一起来，说明了泥塑神像中圣与俗的时代意义。所以笔者认为民间信仰文化与现代化并不矛盾，它不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消失。

（三）文献综述

本研究的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西北民族大学、甘肃省图书馆及地方资料室的藏书和网络资源（人大复印资料数据库、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万方数据博硕士论文、超新电子图书等），以及本人田野作业所得。充分利用文献资料，使之与调查所得相印证，有利于民俗的深入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搜集到国外学者对中国泥塑的研究资料。对此，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学术上的空缺。

因为笔者主要研究寺庙中的泥塑神像，而这种民俗事象的存在是和民间信仰分不开的。国外学者对中国民间信仰、民间庙会进行研究的比较多，主要有：英国的王斯福、弗里德曼；法国的施舟人、劳格文、葛兰言；美国的武雅士、韩书瑞、魏勒、丁荷生、万志英、韩森、康豹；德国的韦伯；荷兰的德格如特；日本的中村哲夫、渡边欣雄、滨岛敦俊、松本浩一、小岛毅，等等。